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华容文史资料

第 八 期

湖南省华容县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日

【专题资料】

回 忆 杜 聿 明

· 韩 梅 村

编者按：

韩老是我县东山乡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三期。原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少将高参和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兼阜新市市长。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原热河省凌源率部起义。起义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八军一六一师师长，江西浮梁军分区司令员，江西省农林垦殖厅副厅长等职。一九七〇年因年老离职休养，现年八十五岁。

韩老与杜聿明先生相交甚深，在为杜先生部属时，甚为杜所器重。今读韩老此文，可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杜聿明先生的为人，同时了解韩老起义前后的一些情况。

杜聿明，字光亭，一九〇四年生于陕西米脂县杜家湾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他的父亲杜良奎是前清举人，曾任陕北绥德师范学校校长。杜聿明在小学毕业后，随父亲就读于这个学校。毕业后与比他大两岁的榆林女子师范毕业生曹秀清结婚。一九二四年夏，杜聿明考入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底毕业。

我认识他是一九二九年秋天，当时他在南京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学生总队（总队长汤恩伯）任中校中队长，我在军校里官研班（班主任周址）任少校区队长。他经常到我们中队来看望周凤岐中队长，因周是杜的陕西老乡，又是黄埔一期同学。这时由周介绍我们认识了。以后我又和他同在一个师，并曾在他的指挥下工作。因此，我们之间有过难以忘怀的交往，特追忆于后。

一

一九三〇年春，国民党第二师成立，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师长。这个师的各级干部多数由军校调任。杜聿明调任第六团第一营中校营长，兼任第二团机关枪连少校连长。蒋、冯、阎中原战争后，第二师改为第四师，师长徐庭瑤。杜聿明升任该师十二旅二十四团团长，兼任特务团第一营营长。一九三一年五月，汪精卫、李宗仁、陈济棠在两广反蒋，第四师由浙江经上海到武汉，准备打广西。在上海聚船时，我这个营恰好与杜聿明同乘一条船，因而我曾临时归杜指挥。在船上三天两夜，我认识到杜聿明对部队管理

严格，工作细致，他不分日夜地从船头到船尾，巡视官兵们在船上的生活情况。从此，我对他有了好感，认为杜是一个好团长。

一九三二年初，湘鄂两边区工农红军东渡汉水，准备越过多平汉铁路与豫、鄂、皖边区工农红军会合，北上抗日（“九一八”以后红军即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蒋介石令徐庭瑤第四师派十二旅到湖北应城“堵击”。当时我这个中校正担任汉阳兵工厂警卫。几天后，听说十二旅在应城、长江埠一带被红军全部消灭，旅长张敬华被俘，两个团长被打死。我当时以为杜聿明已阵亡，很可惜。后来才知道杜在事前恰好请假回陕西奔父丧，打死的是中校团附代兼团长职务的屈凤岐。

杜聿明在办完父丧后回部，重新接收新兵训练。他在两年团长任内，除了勤奋工作外，业余时间还爱好摆弄机械。如他对轻、重机枪拆了装、装了拆，十分熟练。因此，深为徐庭瑤所器重。这也是后来他帮助徐组建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的基础。

二

一九三三年初，第四师调出四个团成立二十五师，杜聿明升任该师七十三旅旅长，我是杜旅一四六团中校团附，团长梁恺称病住院，由我代理团长职务。从这时起，我就较长时间在杜的直接领导下任职。

杜聿明升任旅长后，队伍驻在皖北阜阳。这时，河南军阀崔邦

杰收编后又逃出，聚众近两千人，流窜于豫南沈丘、项城一带，向老百姓要枪、要马、要钱，绑票勒索。河南省主席兼开封绥靖主任刘峙，命杜旅就近清剿。杜对这股匪徒反复无常，本来就痛恨，再加上他的部队也受过崔匪之害，更加痛恨异常——那是一九三一年七月，山东崔匪刘桂棠部队困守河北大名，国民党第四师师长徐庭瑤令当时收编不久的崔邦杰部协同第四师围攻大名城，但崔邦杰有意让开南门，使刘匪得以从库门东窜。由于是深夜，正在东门各村庄休息的杜率明团，突然受到袭击，损失不小。所以杜此次奉命清剿，行动便很谨慎。

因为崔匪狡猾多端，杜旅捕捉了十多天无效果。一个初春的大雪天，豫南平原上雪厚三尺以上，杜旅得以跟踪崔匪人马足迹，但大半天仍未追上。杜率明召集各团团长和旅参谋主任研究情况，再定行止。会上，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认为十多天来部队太疲劳，今天下大雪，应当停下来休息，明天再跟踪追击。旅参谋主任曾泽也同意。于是杜率明问我，我说：“崔匪也要吃饭睡觉，如果我们这时能辛苦一点，忍饥挨饿，继续追上去，崔匪便逃不掉了。”杜同意了 my 意见，并令我团走前头，让戴团吃完饭后跟进。我团快步行军，终于在当天黄昏前追上了崔匪，原来他们这时在一个叫三母子庄的大村子里煮饭吃，并准备住宿在这里。我团当即展开四面包围，不到两小时，便将这股匪徒全部消灭，计打死百余人，生俘近千入，内有“肉票”妇女十多人。清查时没有崔邦杰，只两个头目

宋天祥。杨小猴被打死了。

事后，杜旅集中到蚌埠整训，得到刘峙电令嘉奖，并向蒋介石为杜报功。

三

一九三三年二月底，二十五师奉命集中到河北遵县。这时，“长城抗战”开始，杜旅参加了古北口之战。因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在古北口负伤住院，杜幸明升任副师长，代理师长职务。他协同徐庭瑤的十七军第二师（师长黄杰）、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在南天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近五十天，为民族立下了功勋。

在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后，二十五师驻北平。杜幸明向师长关麟征推荐我主办师训育大队，轮训全师现役班、排长。杜经常来大队指导工作，全大队的干部、学员都对他十分好意，十分尊敬。

一九三四年秋，杜幸明到庐山受训回部后，思想与前大不相同。这年冬，他奉命主办“北平市大学生寒假军训班”；次年春，又主办“北平市中学生集训总队”。这两次，我都作为他的助手，与他生活、工作在一起。也就在这时，我看出了他的本来面貌，他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忠实执行者。有一次，他邀请天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来队演讲，当快要结束时，课堂里突然闻到一股粪便臭气，原来是一个学生大便急了，不敢离座，就拉在裤子里。当

杜知道后，当场表扬了这个学生“听讲用心，遵守纪律。”可是话刚说完，许多学生大笑。这些大笑的学生都被杜认真地批评了一顿。

一九三六年夏，我由旅参谋主任，升任师参谋主任，进一步在杜身边工作。我发觉他这一时期的思想，除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外，还有着唯心主义的封建迷信观念。比如他同关麟征闲谈时，爱讲鬼神故事，并且经常玩弄几个铜钱，占卦问卜。我实在看不过意，有一次冒犯了他们几句。当时杜李明指着我的鼻子笑着说：“李主任的鼻子有点向左歪”！我意识到他这时对我的话已有反感，便不再作声了。

四

杜李明平常一贯工作勤奋、耐心、细致，从不对下级生气、骂人。他从来不吃污腐化，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几位将军。他在副师长任内，对部队的训练、作战，都能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特别是对特种武器的操练、使用，更为熟练。因此，深得徐庭瑤器重。一九三七年春，徐庭瑤在南京组建机械化部队，电召杜李明到南京作助手。从此，他便离开了二十万颗，我也就一度与他分手了。

杜到南京后，初任装甲兵团少将团长，抗日战争开始任师长，继任第五军军长，该军是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他在军长任内，竭力节省开支，把省下来的钱办军需工厂，吸收军人家属到工厂作工；又创办军人子弟学校，就读军人子女。他对妻子曹秀清感情很

谢绝了他的好意。~~但这是最后的一着~~等待我。

五

一九四四年秋，日本侵略军进犯桂林，我举家八口，逃难到广西西南山区。次年初夏，辗转到贵阳。杜幸明知道后，电邀我去昆明，并寄了路费。这时在逃难中，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现实生活，加上杜的盛情难却，我终于应命了。五月中旬，我到达昆明，杜委派我为昆明防守司令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并叫后勤负责人给我置备了行李、衣服。

日本侵略军投降后，蒋介石任命杜幸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同时令十三军（军长石觉）、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由上海、越南海防乘美舰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因为这两个军都是国民党第二师发展起来的，杜幸明比较熟悉。这时，在华北的八路军已开始出关。蒋介石又派出几个军交杜指挥，以壮军力，也就是准备以武力接收东北。

杜幸明决定先带部份参谋、通讯及后勤人员到秦皇岛。临行前一天对我说：“司令部直属各单位（警卫团、通讯团、汽车团等）、家属等由汽车团分批运送到广西南宁。你等一切准备好，待命行动。”我说：“根据昨天的情况汇报（防守司令部每周有一次情况汇报会）林彪已带着十万八路军出关，苏联在东北的军队有可能交防给八路军。如果是这样，我们到东北以后就会有麻烦。”杜说：“我们同

苏军有协定，苏军不会这样干的。当然，我们也要准备打仗：和平谈判，东北不在其内”。又说：“林彪带出关的八路军，有些是徒手，而且装备远不如我们。并听说他们有的连棉鞋、棉大衣都没有，真的打起来，也不堪一击”。他讲这话时很有信心，神情很愉快，看样子他对“接收东北”似乎很有把握。

以后，我带着直属部队从越南海防和鸿基港口乘美国军舰，于十一月底到葫芦岛登陆，这时杜聿明已随五十二军到达锦州。由于我要向他汇报沿途情况和请示他安排直属部队驻地，在我到锦州他的办公室时，看到他正在写日记，我问：“司令官工作这样忙，还写日记？”他说：这是老头子（蒋介石）给我的任务之一，年终还要派专人送呈他批阅”。

六

我跟随杜聿明多年，他一直信任我这个部下。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十三军到了热河阜新市。他保举我任阜新市长，后又兼任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少将司令。由于这时我早与湖南省地下工作人员有联系，所以我在阜新悬挂着国民党接收人员的招牌，干着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阜新的地头蛇不断向杜聿明告状的状，说我有小汽车不坐，出门骑自行车，吃小米，高粱饭，生活和工作作风全象八路军，并说我政治主张乖谬，不打八路军等等。但杜聿明却一直认为我一向生活简朴，“事业”心强，不会背叛他返回共产党。且因原阜新

市有近两万日本人，把他们遣送回国后，市区不到十五万人口，因而市、县合并，撤销了市的机构，这些都是上级指定办的。当时县区有保安部队，有区公所，有警察区分局。保安三支队成立时，经杜聿明同意，把这些危害四乡老百姓的原保安人员和警察等全部集中到县城训练，杜也想把这支无训练、无纪律的人员集中，加以严格训练后为他所用。但在这方面，他也是有所警惕的。他派了一名叫卢广作的中校参谋到我这个支队任上校参谋长，很明显，这个人是在监视我的。我也知道还有国民党军统、中统的特务们也在监视着我的言行。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队疯狂向山东、陕北解放区进攻，杜聿明在东北也集中主力向辽东解放区进攻，原在热河凌源附近的十三军八十九师（师长万全仁）调到辽东作战，同时他也觉得我在阜新不利于工作，便下令将我这个支队由阜新移防到凌源县城，维护锦州到承德铁路线的一段交通。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我到凌源后，在湖南地下党组织派来的邓钧洪、周太昭、陶涛三位同志和热中解放区的十七旅部队帮助下，率部起义了。

起义后，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杜聿明，大意说：我在国民党军队中，您是您的知己上级，按旧的道德观：“士为知己者死”，我应该终身追随您，但我不能背叛人民，不能背叛我们的祖国。在真理面前，我最终作了这样的选择；但您对我个人的关心和照顾，我是

永远不会忘记的。……最后我劝他“及早回头”。“悬崖勒马……”

不知信收到了没有，杜始终没有给我回信。以后听说有人向他探询我的情况时，他只是回答说：“韩梅村在凌源作战中被八路军俘虏了”。

从此，我便离开了杜聿明，投向了人民怀抱，结束了与杜的部属关系。

以后东北的局面因杜患病，蒋又改派陈诚负责，也就是由战略上的重点进攻，改为缩短战线，重点防御。但是陈诚也招架不住，蒋介石慌忙中又派卫立煌去接替。

这时蒋在南京虽当了总统，但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东北战局对他也更加不利。蒋又命杜带病参加辽沈战役，充当卫的副总司令，力图挽救这个残局。

杜聿明奉命后，亲率阙汉骞等三个军，在葫芦岛登陆，指挥部设在葫芦岛，企图支援困守锦州的范汉杰部队。这时我带着东北民主联军独六师，奉命在锦西东南面的拉子山占领阵地。一方面截断山海关到锦西的铁路交通，一方面向葫芦岛和锦西之敌警戒。杜命阙军向拉子山猛攻，几次向我师冲锋均被击退。我十六团还进行了反击，阙军两个师伤亡至少有两千人，而我师也伤亡近千人。整个辽沈战役的结果，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除五十二军一部分得从营口乘军舰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我军消灭。坐镇葫芦岛的杜聿明也只好逃往北平。后来听人说：当他进入北平时，天正下雨，他长

声地叹息说：“东北的失败，天都流泪！”由此可见他对蒋家皇朝的即将覆灭，是何等的悲伤！

同年冬，杜聿明又当上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因总司令刘峙在淮海战役中撤开了总部，杜留守徐州全权代理总司令职务。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改编为四个野战军，第一、四两个野战军，已解放了华北大片地区；淮海地区也已为二、三两个野战军团团包围。毛主席曾写信给杜聿明促其早日投降，但杜坚决与人民为敌，结果为人民解放军所俘虏。

由于他的坚决与人民为敌，在被俘前已定为战犯之一但我党却不记前仇，在关押期间优待他，还给他治好了多年来治愈的病症，并耐心地教育和改造他，毕竟使他诚心地悔悟了，并表示在余生之年，要争取为人民服务。十年后，杜聿明获得了人民的特赦。

七

一九六四年初夏，杜聿明同回国不久的老伴曹秀清，还有某他得到特赦的原国民党高级军官人员来南昌观光，他电话约我见面。一见面他就说：“雪庵（我的别号）兄，你真有先见之明，我无悔之晚矣！”我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爱国不分先后，你现在已走上爱国之路，祝福你愉快地工作，健康长寿”！我们坐下来后，我问他在凌源起义后给他写的信不知收到了没有，我又把那信的内容大意说了一遍，他说：“信没收到，就是收到了，也不会起作用的。”

淮海战役中，眼看蒋家王朝即将崩溃，毛主席写信劝我要明大义，早日回头，我都坚决不听，可见我那时是鬼迷心窍了”。

接着杜问我是不是早就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在我离开五十二军后，才认识了几个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随你到东北，以至到阜新，我都不是共产党员。我问他：“如果那时你认为我是共产党员，会把我怎样？”杜说：“这就难说了，那时如发现真凭实据，我不杀你，蒋介石也不会放过你”。

在谈话中，他还记得当年谈过我的鼻子向左歪，也谈到了他爱讲封建迷信的事。他还谈了一件往事。他说：“一九三五年春，关麟征枪毙二十五师中共地下党员赵永、王正心时，有人密告你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关麟征要关押你。那时你正帮我办北平市中学生集训队，我向关建议：先派人调查。后来调查你没有进步的朋友，也和赵案无关，因而得免”。我说：“谢谢你，如果那时我被关押，结果真不知如何了结了”。在谈到关麟征时，他说关是陕西老乡，但对我这个陕西老乡又并不欢迎。我们又谈到曾任五十二军军长的梁恺，我问他梁现在怎样？他的夫人曹秀清插话说：“梁恺在湖南随陈明仁叛变后逃到香港，现在定居台湾”。杜奉明马上纠正她的话说：“陈明仁是起义，不是叛变”，多为了不使杜夫人尴尬，连忙接口说：“杜夫人从美国回来不久，对新中国的口语不熟悉，不能见怪”。我问杜现在生活、工作、旅游观光有无困难，他说：“在生活上，衣食住行组织上都很关心我们，照顾周到；工作，些

也安排得很好。我们这次来南方观光，也是学习。国家为我们花了不少钱”。谈话中，他十分赞颂共产党，认为旧中国的污垢已一扫而光。过去受外国欺侮，国内军阀又连年内战。现在我们真的站起来了。他说：“过去我戎马丰生，说良心话并非只为了升官发财，也有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只是走错了路，成了国家、民族的罪人。现在党和人民宽恕了我，我只有争取在有生之年，多做点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事，其中包括如何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工作。”“我现在心情很愉快，只是我的几个儿女，有的在外国，多教在台湾，仅我们老两口在一起，感到有些寂寞罢了。”

在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不是过去在东北那样体弱多病，沉默寡言，而是面色红润，高谈阔论，内心充满着喜悦的神情！

一九八〇年十月，我同老伴张剑云到北京小住，我们特去看望了杜幸明夫妇。这时，他们住在崇文门外一栋高楼上，有西房一厅，~~当时住的是个单间~~。那时杜正在病中，房门上贴有“谢绝病客不要打扰”的字条。我们谈了一小时即要告辞，但他俩硬拉着我们不放，并说：“你们两位客人是例外”。曹秀清同志还拉着剑云去参观了他们的卧室、厨房，并叫她的保姆去街上买了许多菜，留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想不到我们这次会见，竟成了永别，每一忆及，不胜怅然！

一九八四年九月于密县